

汪毅夫 著

台灣近代文學叢稿



海峽文藝出版社

汪毅夫 著

名媛近代文选三编

台湾近代文学丛稿

汪 毅 夫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印张 2插页 145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80534—229—6

I·207 定价：2.90元

序

俞元桂

毅夫同志治学，长于辑佚考据。他所编辑的《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四种，颇为学术界所重视。香港大学中文系杨玉峰先生近来函索取，信中说：“《集刊》资料丰富，文章扎实，甚为有用，惜未能继续，诚学术界憾事”，足见评价之佳。1988年初，毅夫始致力于台湾近代文学的研究，继续发挥他治学的特长，历年余而积稿盈筐，用力之勤可见。

从事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人，无不重视史料的搜集和考订，因为这是构筑文学史殿堂的基石。不留意翔实的史料而热心于凭主观见解编排未经审核的史实，其法实不足取。毅夫深知这一道理，所以他对台湾近代文学的研究还是一仍其旧。首先在作家、作品、社团及文化背景方面进行史实考订与整理，在这基础上再尝试作史的编述。鲁迅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里说：“……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鲁迅翁的话十分透彻地道出了“细看一雕阑一画础”的意义，毅夫所做的正是这一类切实的工作。

令人高兴的是，毅夫的《台湾近代文学丛稿》已为出版社接

受而付诸刊行了。据我所知，这书可能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台湾近代文学的专著。作者凭借在大陆发现的台湾近代作家的家乘、佚文、遗物，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丘逢甲、陈浚芝、汪春源、许南英等人的生平史实作了重要的补订；对台湾近代文学社团崇正社、斐亭吟社、浪吟诗社、牡丹诗社、栎社、南社及菽庄吟社的基本情况也详加考证，提出新说。他的考证力求周密，不凭孤证立论。比如，关于施士洁的生平，他不但根据施氏本人的诗文和同时代人著作中的记载，还亲到施氏祖籍地查看施氏族谱、故宅、石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又如，关于牡丹诗社的创立之年，毅夫从当事人施士洁的诗文中找到记载，又查考另一当事人林鹤年的有关诗文，提出了新说。在这样的考订个别史实的基础上又有《略谈台湾近代文学史的分期》和《台湾近代文学史事编年》的写作。可以说，毅夫正在脚踏实地为台湾近代文学史的编述打下基础。

顺应时代的潮流，我国的近代文学呈现了巨大的历史性转折。然而学术界对近代文学一向有些重视不足。台湾孤悬海外，有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上又屡遭外国的入侵，台湾近代文学构成了怎么样的特殊面貌，这自然更当为中外学人所关注。毅夫这一开拓性的学术工作，将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肯定无疑的。

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台湾近代作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其诗文中有充分的表现。本书还就中国科举制度与台湾近代文学的关系，台湾竹枝词和台湾楹联所表现的民俗、方言等进行了研究。这些都说明台湾与大陆文化有着血肉相连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说明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巨大的凝聚力。

这本书的写作，属于台湾近代文学研究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作者的一种探索性的工作。由于材料的限制，难免有一

些疏漏和错误。正因为如此，它的问世一定会引起海峡两岸学人的兴味，促进学术的探讨与交流。我想这也是谦虚的作者著述和出版本书的初衷吧！

1989年8月于福建师大文园

HACO/ov



作者简介

汪毅夫，男，
1950年3月出生。
台湾省台南市人。
文学硕士。曾任福
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讲师。现任福建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目 录

序	俞元桂(1)
鹿耳听鼓浪 莪庄望鲲涛	
——记台南南社暨厦门菽庄吟社	(1)
《窥园留草》识小录	(7)
《后苏龛合集》札记	(15)
《台南市志·艺文篇》订谬	(24)
近代学人游台事迹杂考	(29)
台湾近代文学若干史实考	(35)
台湾的科举和台湾的文学	
台湾竹枝词风物记 (二十则)	(51)
台湾近代楹联小札	(63)
台湾的科举和台湾的文学	(86)
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	(97)
略谈台湾近代文学史的分期	(106)
台湾近代文学史事编年	(119)

〔附录〕

在福建发现的台湾近代作家之佚文遗物(158)
主要作家索引(172)
主要书刊索引(177)
主要社团索引(181)
作者后记(183)

鹿耳听鼓浪 莩庄望鲲涛

——记台南南社暨厦门菽庄吟社

一 台南南社小考

台南南社是台湾近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社之一，在台南，人们至今还流传着“南社创立远在逊清时代，是由许南英倡起”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确实？如果确实，则南社究竟创立于“逊清时代”的哪一年？

生前为南社社友、曾多年致力于台南地方史料之钩稽整理的许丙丁先生是不以南社“由许南英倡起”的说法为然的。他推断说：“许南英风雅所寄者不是南社，而是不甚著名的崇正社，但是南社社友却把南社创立之功归于许南英。推究其故，或许因为崇正社是南社渊源所自，而由许南英、施云舫、邱仙根诸君子所散播推演的诗风经崇正社而浪吟诗社，蕃衍至南社成立而始壮。南社诸社友饮水思源，遂有许南英创立南社的想法”（《五十年来南社的社员和诗》，载《台南文化》第三卷第一期）。自崇正社而浪吟诗社至于南社，其间虽有诗风一脉相承的关系，却不能据此就认崇正社为南社的前身，认崇正社的创立人许南英为南社的创立人，这是可以成立的道理。所以，许丙丁先生将南社

社友相传的“许南英创立南社”之说归为“想法”。

然而，“许南英创立南社”的说法虽然不据自崇正社至于南社的诗风渊源而立，却是确有所据的。其根据就是浪吟诗社同南社之间的前前后继关系，而许南英正是浪吟诗社的倡起人。

《台南市志》（1983年版）卷七《人物志》之《赵钟麟传》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许南英会试中式回乡，办理垦化事业之余暇，邀蔡国琳、胡殿鹏组织浪吟诗社，亦参与焉。……翌（二十三年）乘连雅堂回台，乃邀陈瘦云、李步青，重振浪吟诗社。”据许南英哲嗣许地山之《窥园先生诗传》，许南英是1890年12月间回乡的，照此，则许南英始“办理垦化事业”和“组织浪吟诗社”均是1891年的事。《台南市志》之《胡殿鹏传》和《杨宜绿传》也分别有1891年“组织浪吟诗社”和1897年“重振浪吟诗社”的说法。查许南英之《窥园先生自定年谱》，“组织浪吟诗社”事失记（创立崇正社事亦不载），但在（光绪）“十七年辛卯”条下记有“聘先生掌教蓬壶书院辞未就转荐蔡玉屏孝廉”。蔡玉屏即蔡国琳，原在澎湖厅任文石书院山长之职，经许南英推荐于1891年始掌教蓬壶书院。从许南英推荐蔡国琳事可见许蔡二人相知有素的关系和他们在1891年间时相过从的情形。至于浪吟诗社的其他倡起人赵云石（钟麟）、陈渭川（瘦云）、谢石秋（籁轩）诸人皆是许南英乙未（1895）离台内渡之前的旧友。许南英的作诗主张也与浪吟诗社宗旨相合。许南英《谈诗》诗曰：“风雅何人守一经，悬河巨口信纵横。五千年上无诗学，三百篇中有正声。乐府汉唐编古体，骚坛李杜占诗名。兴观群怨皆天籁，托兴随人籁自鸣。”此诗足可为“浪吟”二字作解。许南英丁酉（1897）年所作《题〈菽园赘谈〉》（此诗未收入《窥园留草》）也有“月能自照宜留影，花岂无香便累名。不用人怜知舌在，从教鬼泣是诗成”句。许南英自称“少年喜结诗文会”，他

与蔡国琳、胡殿鹏、陈瘦云、谢籁轩诸人交谊既深，意见又合，倡起浪吟诗社正是很自然的事。

南社是在浪吟诗社“诗友零落”的情况下成立的。连雅堂先生《台湾诗社记》称台南南社的筹建之议为“以社友零落，复谋振起”，称南社的成立为“改创南社”。用南社名义发布的第一个文件《南社中兴小启》也以南社的成立为“中兴”之举。这说明南社社友是确认浪吟诗社为南社前身的。从社友情况看，南社正是在浪吟诗社基础上改创的。南社第一批成员（凡十八人）中包括了除许南英以外的浪吟诗社辛卯初创和丁酉重振时期的全部重要成员：蔡国琳、赵云石、谢籁轩、连雅堂、杨宜绿等，并推蔡国琳、赵云石为第一任正、副社长，谢籁轩为干事。以后，又有原浪吟诗社社友多人加入。

那么，南社究竟创立于哪一年？关于南社的成立之年，我们所见有1891年、1897年和1906年三说。这三说中，1906年是《南社中兴小启》的发布之年，是严格意义上的南社创立之年；1891年之说则将南社的创立上溯到其前身浪吟诗社的初倡。这也自可备为一说。至于1897年之说，是误将浪吟诗社的重振之年当作初倡之年了，它因而不足据信。

日人据台，曾禁吟事，以致台南曾有酉山吟社诗人“将该社十余年来积存吟稿，埋在开元寺左侧庭院七弦竹旁，树诗魂碑，以资纪念”的可歌可泣之事（事见连景初《海峤偶录》）。台南南社在日人据台时期勉力维持近四十年，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首爱国的诗。南社诗人并写有大批爱国诗篇，如连雅堂的《台南》诗：“文物台南是我乡，劫来何必问行藏。奇愁缱绻寄江柳，古汉滂沱哭海桑。卅载兄弟犹异宅，一家儿女各他方。夜深细共荆妻语，青山青史尚未忘”等，令人读而肃然起敬。

二、菽庄吟社记事

厦门菽庄吟社创立于1913年。

菽庄吟社社主林叔臧（尔嘉）、林景仁（健人）父子系台湾省台北市人。辛亥鼎革，林氏父子乃在厦门鼓浪屿买山拓地，仿台北板桥林氏故居修筑菽庄花园；癸丑之年，林氏父子又有邀集名流结菽庄吟社之举。

菽庄吟社社友有施士洁、许南英、汪春源为社中三老。此三人者，台南乡贤也。

台湾学者黄典权教授曾撰文指出：“清代末期，台湾文风大盛，而以台南为最。自道光以降，人才辈出，科名联翩。到乙未（西历1895年）割台，安平县籍的进士健在的一时有陈望曾、施士洁、许南英、汪春源诸先生。他们都是志士，加以身登科甲，自然不愿为异族之民，故前后内渡，分别居闽粤两省，都替国家做了不少事情。他们都是值得国人纪念的人物。尤其在台南市，更应尊为乡贤而永志勿谖”（《两件新史料》，载《台南市政》第八期）。

施士洁、许南英和汪春源三进士早年在台南颇负文名，他们都是唐景崧所主之斐亭吟社的社友，同为台南崇正社的中坚人物。许南英还是台南浪吟诗社的倡起人，被台南南社社友尊为开社之人。甲午、乙未年间，施士洁、许南英和汪春源共同参加了抵制割台之议的爱国义举。许南英出任筹防局统领，施士洁曾协同募军和随同行军（施士洁有《同许蕴白兵部募军感送前韵》、《瀛南军次再迭前韵示同事诸子》等诗记其事）；汪春源则于甲午、乙未之年在京应试，他参加了名震中外的“公车上书”运动，并参与台湾举人单独举行的向都察院上书的活动。乙未割台，施士洁、

许南英、汪春源耻为异族之民，先后内渡。施士洁归于福建晋江西岑故里，许南英和汪春源则寄籍福建龙溪。施士洁、汪春源和许南英分别于1913、1914和1915年应聘为菽庄吟社社友。台南三进士自此入于厦门菽庄吟社并成为诸社友所推重的执牛耳之人。他们在菽庄吟社期间朝夕相处（菽庄主人为社友提供寓所并月给津贴若干），吟咏酬唱，每多眷念台南故里、盼望家国江山统一之音。

厦门与台湾仅一水之隔。流寓于厦门鼓浪屿的台南三进士都是爱国人士，家国破碎之恨、眷念故园之情和身世飘零之叹自然不能不常系于心，台南的山川文物、历史人文常入于他们的梦中，亦常见诸他们的诗词。如：施士洁《壬子除夕》：“醉矣一千日，乐哉三百年。沧桑又陵谷，隐逸即神仙。鹿耳家何在？峨眉老可怜。屠苏应笑客，今夕不成眠！”许南英《题林叔臧鼓浪屿菽庄（之二）》：“卜筑园林近洞天，避人避世地成仙。听潮楼上频东望，鹿浪鲲涛一怆然。”汪春源《移寓（之七）》云：“星星鲲澥几遗民，何处桃源好隐沦。世变沧桑成幻梦，几岁梅雪伴吟身。”这些诗词叙乡情、国恨和身世之叹，读来是何等感人！

菽庄吟社有过几次全国范围的诗文征集活动和同台南南社的交友活动。其中最可记取的有三事：

其一、1914年菽庄主人四十寿辰，闽县林琴南先生有诗为贺：“四十年前过板桥，陈陈景物忆前朝。却看鲁殿灵光在，坐见昆明劫燹销。一老精神寄山水，诸郎英发想风标。勋名宁为先生祝，但把乔松比后雕。”是诗收于菽庄吟社编录的《菽庄主人四十寿言》一书。林琴南先生于1867至1869年曾寓居台湾，1878年又有赴台奔弟丧之行。“四十年前过板桥”所记当是林琴南先生当年过访台北板桥林氏故居事。在这次祝寿活动中，有台南南

社社友连城璧（连雅堂先生之胞兄）往贺，其贺诗亦收于《菽庄主人四十寿言》一书。

其二、许南英被聘为菽庄吟社社友后，于1916年回台南省墓访友，在台南居留近三个月。其间，许南英日日与南社社友相聚，参加南社同人雅集，同游台南公园、延平郡王祠、开元寺、关岭、五妃墓等，题赠唱和，临别并有重来之约。

其三、1928年正月，菽庄吟社社主林景仁（时居台北）偕社友沈傲樵等人，应南社第三任社长黄南鸣（自号固园主人）之约，游台南固园。黄南鸣偕南社社友设宴欢迎。席上，两社社友相谈甚欢。林景仁有《固园主人昆仲招饮归途车中赋呈请南社诸君郢政》一诗为志。

台南南社和厦门菽庄吟社都是值得史志记载的文学社团。翘首闽云，东望鲲涛，盼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心志将两社诗人联结在一起。

《窥园留草》识小录

许南英先生所著《窥园留草》乃是台湾近代文学的珍品。许南英（1855—1917），号蕴白，自号窥园主人，台湾省台南市人。许南英的一生跨中国近代史的前期和后期，历甲午之役、割台之议、日人据台、辛亥鼎革、袁氏称帝诸历史事变；其《窥园留草》正是“一个台湾名进士家破国危，幽忍凄切的心声，交织着很多地方掌故以及当时文人风雅际会言行的纪录。所以留草的文献价值，好像比同时代的一些诗文集更高得多”（黄典权：《窥园留草·后记》台银印本）。

《窥园留草》于1933年6月由北京和济书局刊行时，只印制五百部。据《台湾文献》报道，《窥园留草》的初版本在台湾仅有两部私家藏本，以收藏台湾文献见著之台北图书馆，就未见此书的著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于1962年9月据初版本印有“台银印本”，列为“台湾文献丛刊”第147种。在福建，就笔者闻见所及，《窥园留草》的初版本在漳州市图书馆藏有一部。汪春源先生的后人在厦门，也曾藏有一部。惜汪家藏本在“十年浩劫”时期沦于行劫者之手，已不知下落。笔者现有漳州市馆藏本的复制本，时时展卷诵读，每不忍释手。

本书所录，为笔者读《窥园留草》的札记。

《窥园先生诗传》辨误

《窥园留草》收诗一千余首，兼附年谱及诗传，许南英之言行风旨深切可晓矣。编录《窥园留草》和撰写《窥园先生诗传》，这是许南英哲嗣许地山于文学的又一贡献。

《窥园先生诗传》里有三处记载直接关系到台湾近代文学史上崇正社的成员、许南英的事迹和菽庄吟社的创立之年三桩史实的正确记载，因而有必要逐一略作考订。

(一) 《窥园先生诗传》记：“二十四岁，先生被聘去教家塾，不久，自己又在窥园里设一个学塾，名为闻樨学舍。当时最常往来底亲友是吴樵山（子云）、陈卜五、王泳翔、施云舫（士洁）、丘仙根（逢甲）、汪杏泉（春源）、陈省三（望曾）、陈梧冈（日翔）诸先生。他底诗人生活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这里有一处误记，许南英受广储东里林家聘为塾师以及“设教闻樨学舍”是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的事，而吴樵山先生则已在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9月26日游冈山时暴疾而死。《窥园先生自定年谱》在（光绪）“三年丁丑二三岁”条下记有“吴樵山公卒”。《窥园留草》也收有《挽吴樵山外舅》并注云：“外舅于丁丑九月廿二日尚过窥园坐谈半日，廿六日而讣至。”照此，则吴樵山不应是许南英二十四岁开始其“诗人生活”以后“最常往来的亲友”之一。

许南英发起和主持崇正社的活动是在1878—1890年间，论者遂以《窥园先生诗传》所开列的吴樵山、陈卜五、王泳翔、施云舫、丘仙根、汪杏泉、陈省三、陈梧冈诸人为崇正社成员。如赖子清《古今台湾诗文社》（载《台湾文献》第10卷第3期，1959年9月）记：“台南市武馆街许南英，光绪四年，年仅二十四，